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錢鍾書手稿集
MANUSCRIPTS OF QIAN ZHONGSHU

外文筆記 總索引



創始於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二〇一五年·北京

錢鍾書手稿集

(總索引)
外文筆記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總索引 /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ISBN 978-7-100-11708-1

I . ① 錢… II . ① 商… III . ① 錢鍾書 (1910 ~ 1998) —
手稿—選集 IV . ① C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56624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

總索引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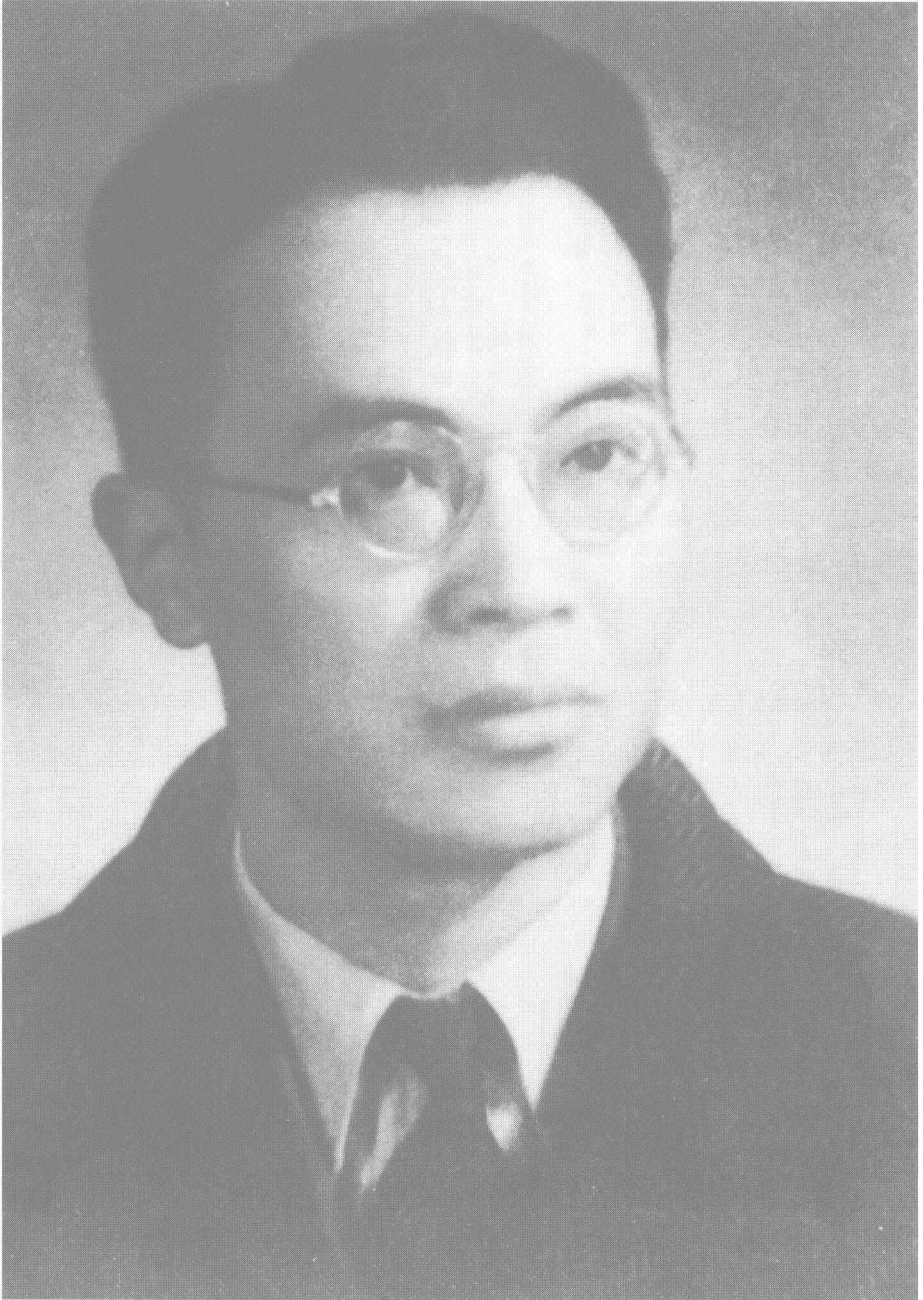
ISBN 978-7-100-11708-1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開本 787 × 1092 1/16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24 1/2 插頁 2

定價：450.00 圓



錢鍾書 (Qian Zhongshu, 1910—1998)



1952 年於中關園
(in Zhongguan campus in 1952)



20 世紀 80 年代於三里河南沙溝寓所
(in his family, at Nanshagou, Sanlihe, in 1980's)

《錢鍾書手稿集》序

許多人說，錢鍾書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為自己有那麼“神”。他只是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在筆記上不斷地添補。所以他讀的書雖然很多，也不易遺忘。

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因為飽蠹樓的圖書向例不外借。到那裏去讀書，只准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邊讀邊記。鍾書的“飽蠹樓書記”第一冊上寫着如下幾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與絳約間日赴大學圖書館讀書，各携筆札，露鈔雪纂，聊補三篋之無；鐵畫銀鈎，虛說千毫之禿，是為引。”第二冊有題辭如下：“心如椰子納群書，金匱青箱總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無魚。（默存題，季康以狼雞雜毫筆書於燈下。）”這都是用毛筆寫的，顯然不是在飽蠹樓邊讀邊記，而是經過反芻，然後寫成的筆記。

做筆記很費時間。鍾書做一遍筆記的時間，約莫是讀這本書的一倍。他說，一本書，第二遍再讀，總會發現讀第一遍時會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讀幾遍之後才發現。

鍾書讀書做筆記成了習慣。但養成這習慣，也因為我們多年來沒個安頓的居處，沒地方藏書。他愛買書，新書的來源也很多，不過多數的書是從各圖書館借的。他讀完並做完筆記，就把借來的書還掉，自己的書往往隨手送人了。鍾書深諳“書非借不能讀也”的道理，有書就趕緊讀，讀完總做筆記。無數的書在我家流進流出，存留的只是筆記，所以我家沒有大量藏書。

鍾書的筆記從國外到國內，從上海到北京，從一個宿舍到另一個宿舍，從鐵箱、木箱、紙箱，以至麻袋、枕套裏出出進進，幾經折磨，有部分筆記本已字迹模糊，紙張破損。鍾書每天總愛翻閱一兩冊中文或外文筆記，常把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我曾想為他補綴破舊筆記，他却阻止了我。他說：“有些都沒用了。”哪些沒用了呢？對誰都沒用了嗎？我當時沒問，以後也沒想到問。

鍾書去世後，我找出大量筆記，經反復整理，分出三類。

第一類是外文筆記（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極小部分是鍾書用兩個指頭在打字機上打的，其餘全是手抄。筆記上還記有書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頁數。他讀書也不忽略學術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關文學、哲學、政治的重要論文，他讀後都做筆記，並記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鍾書自從擺脫了讀學位的羈束，就肆意讀書。英國文學，在他已有些基礎。他又循序攻讀法國文學，從十五世紀到十九

世紀而二十世紀；也同樣攻讀德國文學、意大利文學的歷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細讀，並勤勤謹謹地做筆記。這樣，他又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學基礎。以後，他就隨遇而讀。他的筆記，常前後互相引證參考，所以這些筆記本很難編排。而且我又不學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譯《圍城》的德國漢學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 Monika Motsch）來北京。我就請她幫我編排。她看到目錄和片斷內容，“饞”得下一年暑假借機會又到北京來，幫我編排了全部外文筆記。筆記本共一百七十八冊，還有打字稿若干頁，全部外文筆記共三萬四千多頁。

鍾書在國內外大學攻讀外國文學，在大學教書也教外國文學，“院系調整”後，他也是屬於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別的工作，以後又借調中國古典文學組，始終未能回外文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也始終未能如願。那些外文筆記，對他來說，該是“沒用了”。但是對於學習外國文學的人，對於研究錢鍾書著作的人，能是沒用的嗎？

第二是中文筆記。他開始把中文的讀書筆記和日記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識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時，他風聞學生可檢查“老先生”的日記。日記屬私人私事，不宜和學術性的筆記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記部分剪掉毀了。這部分筆記支離破碎，而且都散亂了，整理很費功夫。他這些筆記，都附帶自己的議論，亦常常前後參考、互相引證。以後的筆記他都親自記下書目，也偶有少許批語。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的數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類是“日札”——鍾書的讀書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開始的。最初的本子上還有塗抹和剪殘處。以後他就為日札題上各種名稱，如“容安館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齋日札”；署名也多種多樣，如“容安館主”、“容安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還鄭重其事，蓋上各式圖章。我先還分門別類，後來才明白，這些“館”、“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調整”後，我家居住的中關園小平房（引用陶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以後屢次遷居，在鍾書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稱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冊、二千多頁，分八百零二則。每一則只有數目，沒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寫的，雜有大量外文，有時連着幾則都是外文。不論古今中外，從博雅精深的歷代經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說院本，以至村謠俚語，他都互相參考引證，融會貫通，而心有所得，但這點“心得”還待寫成文章，才能成為他的著作。《管錐編》裏，在在都是日札裏的心得，經發揮充實而寫成的文章。例如：《管錐編·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共九十五頁，而日札裏讀《楚辭》的筆記一則，只疏疏朗朗記了十六頁；《管錐編·周易正義》二十七則，共一百零九頁，而日札裏讀《周易》的筆記，只有一則，不足十二頁；《管錐編·毛詩正義》六十則，共一百九十四頁，而日札裏讀《毛詩》的筆記二則，不足十七頁。

鍾書在《管錐編》的序文中說：“……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初

計此輯尚有《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懶，不能急就。”讀《全唐文》等書的心得，日札裏都有。他曾對我說：“我至少還想寫一篇《韓愈》、一篇《杜甫》。”這兩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懶”，都沒有寫出來。日札裏的心得，沒有寫成文章的還不少呢。

這大量的中、外文筆記和讀書心得，鍾書都“沒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對於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總該是一份有用的遺產。我應當盡我所能，為有志讀書求知者，把鍾書留下的筆記和日札妥為保存。

感謝商務印書館願將錢鍾書的全部手稿掃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眾。我相信公之于眾是最妥善的保存。但願我這辦法，“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楊絳 敬序

二〇〇一年五月四日

出版說明

錢鍾書(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字默存,江蘇無錫人,中國當代著名的學者和作家。著有《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等學術著作,小說《圍城》、散文集《人·獸·鬼》等文學作品。

錢先生酷愛讀書,一生用於讀書的時間遠多於寫作,且每讀一書必做筆記。完全可以說,業已出版的錢先生的著述只顯露了他的學問之冰山一角,更豐富的寶藏是在尚未付梓的讀書筆記裏。這些筆記的手稿由錢先生的夫人楊絳女士妥善保存至今,其書寫時間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數量十分驚人,內容也極其豐富。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容安館札記》,以讀書時的感想和思考為主要內容;二,《中文筆記》,為閱讀中國典籍所做的筆記,原稿多達一萬五千頁左右,涉獵極廣,所讀所記包括經史子集、小說院本、鄉謠俚語、野史等;三,《外文筆記》,數量最大,共二百一十一個大小筆記本,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臘七種語言的書籍,題材包括哲學、語言學、文學作品及批評、文藝理論、心理學、人類學各個領域乃至通俗小說、笑話、百科全書等。錢先生的讀書筆記既反映了一個偉大學者的閱讀和研究歷程,也是一個精華薈萃的思想寶庫,宛如一座體現了錢先生個性的特別的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本着對文化積累和文物保護的責任心,決定將錢鍾書先生的讀書筆記全部出版。其中,凡由錢先生手寫的筆記一律影印,小部分打印筆記擬排印出版。手稿共分三部分,即《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分三批陸續出版。我們曾考慮排印全部手稿,以方便讀者,但因整理工作是一項巨大的學術工程,一時難能如願。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還是將手稿的原貌公諸於世。

全部手稿的原件,均由楊絳女士提供,各卷的次序也由她親自審定。

願《錢鍾書手稿集》的出版能對海內外有志於讀書和治學的廣大讀者有所裨益。在此我們謹向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此書出版的朋友致以誠摯的謝意。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二〇〇三年三月

錢鍾書的《外文筆記》

古時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埃及的吉薩“金字塔”，菲迪亞斯在希臘奧林匹亞的宙斯神像。以後，世界奇迹的名錄增加了，也包括了中國的長城。《外文筆記》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國與世界分隔開，而是像一座“萬里長橋”，把中國與世界聯繫在一起。

《外文筆記》始作於 1936 年牛津 Bodleian Library——錢先生戲稱為“飽蠹樓”——因為那裏不能將書外借（楊絳：《錢鍾書手稿集序》）。其實，這只是外在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錢先生與書籍一生相伴、“命中注定”的緣分：過周歲生日時，家人把裝着錢、小玩藝兒、糖果等東西的托盤推到他面前，讓他抓周兒，他挑中了一本書。於是，就給他起了“鍾書”這個名字。他畢生有“書癖”，這種嗜好伴隨着他從歐洲到中國，經過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和幹校生活，陪伴他渡過了幸福時光與艱難歲月。

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 1978 年，在意大利奧爾蒂塞伊（San Ortisei）舉行的國際漢學家會議上，他用英文做了一個精彩的報告。¹ 這次經歷促使我與中國友人史仁仲（1944—2005）一起翻譯了小說《圍城》。1982 年，我第一次去他們北京三里河的家，拜訪了錢先生和他的夫人楊絳先生，向錢先生請教小說中的一些問題。或許，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在無意中接觸到了《外文筆記》。我向他瞭解方鴻漸和一行人在內地一家簡陋的旅館裏渡過飽受折磨的一夜的情節：“蒙馬脫爾的‘跳蚤市場’和耶路撒冷聖廟的‘世界蚤虱大會’全像在這歐亞大旅社裏舉行。咬得體無完膚，抓得指無餘力。”（《圍城》第五章）

錢先生提到了《以奧登》這部著作，後來，他又寫信給我進一步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法人所寫中東遊記（e.g. that minor classic A.W. Kinglake's *Eöthen*），都提到耶路撒冷廟中的 vermin。”也許，錢先生當時也參考了自己的筆記。不管怎樣，多年以後，我在《外文筆記》中又重新見到《以奧登》和耶路撒冷聖廟中的跳蚤。

一、《外文筆記》的彙編

第一份書目清單

1999 年夏天，也就是錢先生逝世半年後，我第一次見到了外文筆記。那時，楊先生剛剛先後失去了女兒和丈夫。儘管處在身體和精神崩潰的邊緣，她仍然覺得將錢先生的遺作留給後世是她的責任。於是，她做起吳剛伐桂似的工作，為出版他的中文、外文筆

1 “The mutual illumination of It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 big theme: some small instances”.

記做準備。她為筆記貼上很多細小的頁碼，有些還加了評語。如果没有她的工作，這些筆記也不可能成功出版。當時，楊先生請我幫她整理《外文筆記》。她風趣地用狄更斯筆下胖孩子¹的語氣給我寫道：“現在我要學 *Pickwick* 裏的 fat boy 的口吻向你報告兩句話：1. I want to make your mouth water, and then 2. I want to pick your brains. (Can I ‘make your flesh creep, Missus’?) 錢先生的中、外文筆記我已整理一過，外文手抄讀書筆記本約 180 冊，都是 golden lines。”

我當然被楊先生的興奮所感染。我没有想到，當我 1999 年和 2000 年暑假去北京時，等待我的是怎樣的探險。《外文筆記》裝在大箱子裏，擺放在楊先生家。那是成千上萬頁有關整個西方文學的摘要。筆記用 7 種文字寫成，主要是英文，但也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還有拉丁文和希臘文。部分是裝訂好的本子，部分是裝在信封裏的散頁，很多是手寫的，另外一些是錢先生自己用打字機打的。一瞬間，嘆為觀止的西方文學全貌展現在我眼前，充滿尚未解開的秘密。

當時，我没有時間按照年代或內容整理。我急中生智：先給放在箱子裏的所有筆記本和夾子編號，總共有 211 本。之後我給每一本打出帶有編號的目錄。這樣我就整理出了《外文筆記》的第一份目錄。然而，在這期間我發現我編的順序非常雜亂無章：比如最早的、在“飽蠹樓”完成的兩本筆記，當時的編號並不是 1 和 2，而是 118 和 119。我那時没有想到，十幾年以後還會有機會重新整理這部筆記。

新任務

商務印書館承擔起完整出版中、外文《錢鍾書手稿集》這項巨大的工程。2003 年出版了 3 卷本《容安館札記》，2011 年接着出版了 20 冊《中文筆記》。第三個，也是最龐大的項目就是出版 48 冊《外文筆記》。編輯出版任務再次落到陳潔和田媛女士身上。她們聯合出版社外語編輯組成高素質團隊，並協助他們工作。

除了楊先生，大力促成此事的人還有她的好友、傳記作者和法律顧問吳學昭先生。楊先生喜歡叫她“Doña Quijote”（女堂·吉訶德），因為她就像西班牙騎士一樣為了幫助別人敢於冒最大的風險。吳先生與清華大學和商務印書館保持着密切聯繫。最後，她也把我和我丈夫莫律祺動員起來。我承認，没有大吳“女將軍”的領導能力，我們——用她的話說——是不會接受這項“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

分成六輯

2012 年 4 月，我丈夫和我在清華大學重新查閱和整理《外文筆記》。我們很快發現：

1 胖孩子 (fat boy) 是狄更斯小說《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人物，是個愛睡覺的胖孩子。有一天，人們以為他在花園裏睡覺，但他却醒着，看到了花前月下的浪漫約會，而且胖孩子馬上告訴了老太太，使老太太緊張得要命。下面兩句英文的大意是：1. 我要讓你饑涎欲滴；然後，2. 我要搶走你腦力勞動的成果。（會不會“讓你毛骨悚然”？）

鑒于資料浩繁，完全無法預計重新系統編輯它們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和人力物力。因此，楊先生決定，同之前出版錢先生的手稿遺著一樣出版影印本：三萬多頁筆記由出版社掃描下來，以便以後按約七百頁一冊出版，共分 48 冊。我們的任務是，給原來隨意排列次序的筆記重新編排合理的順序，並整理出一份更好的目錄。

工作中，我們得到商務印書館和清華大學的全力支持。清華大學的池淨女士為我們創造了理想的工作條件。我們可以在清華大學的大會議室把筆記攤開放在桌子上，仔細查閱。關於筆記順序，我們採用了兩種不同的劃分標準將全部筆記分為六輯：

首先，我們把裝訂好的筆記本，除了摘錄期刊的本子之外，按年代、根據錢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轉捩點分成四輯。

其次，散頁整理成第五輯，而以期刊為摘錄對象的筆記本整理成第六輯。

編制目錄

按照年代順序整理前四組筆記不僅需要偵探式的嗅覺，有些時候甚至需要慧眼識珠的能力；如果這些沒有用，還需要勇氣妥協或者留下空白。像錢先生在牛津時期完成的最早兩本筆記中那樣準確記錄時間和地點的並不多。對整理有幫助的是寫着“Texts without contexts”、“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的系列筆記。偶爾會有好運氣，如錢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學院（Exeter College）的筆記本，或者在本子前面記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寫上他想去的圖書館的名字。連比較筆記本的封皮也有用，還有偶爾印在筆記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特別有啟發性的是錢先生的字迹，隨着歲月流逝，它們也隨着他的生活狀況發生着變化。

有些摘錄是用多本筆記本連續完成的。這樣，常常可以看到“continued”（續）、“will be continued”（待續）、“concluded”（結束）等提示相互參照的字樣。但是，我們並不能完全核實這些提示之處。由此可以斷定，錢先生是在不同時期完成了這些筆記，有些筆記本也許已經遺失。

尤其困難的是找不到上下文關聯的散頁。這種情況在第五輯的手稿中出現得尤其頻繁。我們首先嘗試靠比較筆記內容重新找到正確的連接位置。如果不行，就歸類為“stray leaves”，這是借用楊絳先生在編輯中遇到類似問題時所使用的術語。只是，我們常常無法還原散頁的原有順序。為此我們推斷：某些頁筆記或許丟失、毀壞或者順序打亂了。但是，那些無法歸類和不完整的筆記散頁，我們也仍然收錄進來，希望能夠借助讀者的敏銳嗅覺找到這頁或者那頁筆記的正確歸類。

2012 年 5 月返回德國以後，我們開始給每條目錄找到頁碼。在唐岫女士的幫助下，我們的工作壓力明顯減輕了。她是北京大學畢業生，目前在德國從事教學工作。我們三個人一起，進展迅速，而且每個人要再檢查一遍另外兩個人的工作，這樣可以更好地避免錯誤。

我們必須在掃描的筆記中找到每一條書目開始的地方。然後，我們把相應的掃描頁碼歸到目錄中的書目下，以便出版社可以確定頁碼。這是一件特別花費時間的工作，因為錢先生常常把字一直寫到紙的邊緣，紙上寫滿了補充的筆記，這樣，就使各條筆記的開頭和結尾不那麼容易找到。

令人高興的是，幸虧商務印書館掃描得非常仔細，混淆和漏掉的很少。對這六輯筆記，我們每一輯都分別彙總了四個表格：

1. 掃描頁碼：它包括作者名和標為斜體字的書名，期刊部分用的是雜誌名稱，還有出版年份，再加上各條書目的掃描頁碼。
2. 眉題文字：從目錄中提煉出簡短的眉題文字，以便翻閱時更容易辨別。
3. 插圖表：放在每卷卷首的彩色插圖。
4. 勘誤表：列舉出可能出現缺頁或錯置的現象，以便出版社核對原件。

索引目前僅僅以目錄為基礎，希望將來有人能進一步加以分類，這項工作還有待今後的科學研究。

二、《外文筆記》概況

我們在整理時發現嚴格按照標準分類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把各冊筆記和卷宗拆開。但這種做法會破壞錢先生自己安排的順序，不予考慮。我們最高的出版原則是出版忠實于原文的文獻。這裏簡要介紹一下六輯的概況，其他細節請參看每輯的簡介。

1. 錢鍾書在歐洲，10本筆記（1935—1938）

1935年，新婚不久，錢鍾書與他的夫人楊絳一起前往牛津埃克塞特學院。他們唯一的女兒錢瑗（1937—1997）也是在那裏出生的。1937至1938年錢先生又繼續在巴黎學習一年。

錢先生在極短的時間內大量閱讀了西方語言文學著作。對此，楊先生寫道：“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後來又加上意大利文。這是愛書如命的鍾書恣意讀書的一年。”（《我們仨》第三部第四章）

這輯早期筆記摘錄的內容比較短，目錄信息還沒有以後的那麼詳盡。開始時以英文為主，後來加入其他語言。最初，對某些文字還寫了英文譯文，但不久就略去了。錢先生在這個時期的朝氣蓬勃也體現在字迹上：狂野的筆觸、書法般的字母。

2. 年輕作者和學者，29本筆記（1938—1949）

1938年，錢鍾書先生帶着妻子和女兒回到被日本侵華戰爭與國內戰爭破壞得支離破

碎的故國。日本人占領中國東部沿海大城市時，人們紛紛向西逃往內地。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雲南昆明成立了。錢先生在那裏做了一年教授，之後去湖南省藍田師院工作了一年，他的父親也在那裏教書。後來錢先生、楊先生和她的家人逃往上海“孤島”。這座有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租界地的城市直到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都一直未遭受日本人的全面破壞。日本占領上海後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這裏充斥着占領者的暴行、饑荒和住房奇缺。錢先生失業了，僅靠給人補課和代課聊以爲生。而另一方面，這却是他們創作非常豐富的時期。楊先生在戲劇舞臺取得了輝煌成就，錢先生創作了小說《圍城》和學術著作《談藝錄》，正是這兩部作品後來讓他蜚聲全國。

這個時期的筆記，內容比以前更加豐富，包括學術上準確的目錄信息。除了英文，還有用法文和德文摘錄的文學原著。一部分是系列筆記，例如：“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 Notes in an Attic”（亭子間讀書筆記）。由此可見，錢先生對他的筆記賦予了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3. 生活在新中國，82 本筆記（1949—1972）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錢鍾書和楊絳面臨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應該去國外。他們本有機會離開，在歐洲或美國找到工作。但他們毅然決定留在國內。他們在國內有許多親人和朋友，他們不想在國外做二等公民，與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隔絕。

開始時，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好了很多。錢先生與楊先生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後來又在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但沒過多久，針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開始了。楊先生在後來寫的小說《洗澡》（1987）中描述了這段歲月。“文化大革命”中，錢先生和楊先生被當作“牛鬼蛇神”受到批判。1969 年，他們隨整個社科院一起下放到農村的幹校接受改造（參看楊絳《幹校六記》，1980）。

在“文革”時期，很多西方作品被視爲有害的“毒草”。在鄉下的幹校裏，錢先生的這些筆記是寶貝，傳來傳去，數易其手。這讓我們感到：《外文筆記》保存了下來，真像是個奇迹。

4. 國內外名人：35 本筆記（1972—1998）

1972 年，錢先生和楊先生終於可以從幹校返回北京時，他們原來的住處已經無法居住。於是，他們逃到女兒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宿舍，接着又在社科院一間辦公室裏住了三年。這期間，錢先生病得非常嚴重：路走不穩，話說不清，字寫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經過醫生診斷，確診是哮喘使他的大腦皮層因缺氧而硬化。對這個病沒有藥物，痊癒的唯一機會是靜養。果真，一年以後，他才慢慢恢復，症狀隨之消失。

令人驚訝和贊嘆不已的是：雖然生病、居住條件非常窘破，他們却仍然繼續工作。

楊先生用錢先生讀書的樂趣來解釋這一點：“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裏。鍾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我們仨》第三部第十四章）

在狹小的辦公室裏，楊先生學習西班牙文，翻譯《堂·吉訶德》。錢先生參考他的筆記還有重新對他開放的圖書館裏的書籍寫作巨著《管錐編》，首次以西方文學為鏡子探討中國古代經典。

直到 1977 年，他們全家才搬進三里河的住房。隨着學術著作《管錐編》（1979）出版和《圍城》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播放（1991），錢先生開始揚名世界。但之後病魔再次降臨。1993 年，錢先生因患癌症切除了右腎。從此之後，他臥床不起。1998 年，他在住院多年之後辭世，住院期間，楊先生每天看望并精心照顧他。

5. 用打字機打出的書摘，32 個夾子

錢先生打出來的手稿自成一部分。他親自把它們彙總成很多冊，或許已經開始準備出版了：他為它們編上標題目錄，還有頁碼。總共 32 本散頁中的前四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這樣整理的。

6. 普通和學術期刊，23 本筆記（1954—1992）

錢先生閱讀和摘錄定期出版的專業雜誌和一般雜誌，以此關注當時的時事和文學動態。這部分遺作有整整 23 個寫得密密麻麻的本子。他通過這種方式把握時代的脈搏。

三、錢鍾書先生的摘記藝術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外文筆記》是一項開拓性工程，是一次值得人們大加讚賞的勇敢行爲。當然，某些評論者可能會問：這樣大型的項目用處何在？值得花費這麼多時間和財力嗎？現在有很多人預測“書籍死亡”，這樣的工作不是浪費嗎？而且，如果是對西方文學單純的摘記，直接從互聯網下載不是更簡單嗎？還要這些“古董”做什麼？

我們知道：錢先生曾計劃用英文寫一部西方文學史，作為《管錐編》的對照。在《管錐編》裏，西方文學是鏡子，用來更好地研究中國文學。而新作品，原本計劃以西方文學為中心。但這已經不可能了。這些筆記本難道就只能束之高閣了嗎？

這些筆記與錢先生本人是分不開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對書籍的熱情、驚人的語言知識、無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對生活的興趣：文學、哲學、心理學、語言學、

歷史學和政治學、書信和自傳、優美的詩歌、通俗的故事、輕鬆的笑話、情色、語言遊戲……一切都令他感興趣，也值得他用飄逸的書法把長長的段落記錄下來。這使摘錄筆記變得有趣而充滿享受。我們感覺到：進入錢先生的筆記世界裏，讀者便置身於一個令人興奮的環境中，總能獲得驚喜，總能有新的發現。

摘錄的藝術是東方和西方古老的文人傳統，在中國尤其受到重視。錢先生對這種傳統掌握得比任何人都好，在筆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對書籍和在摘錄中“探險”的興趣。

即使對我們歐洲人來說，錢先生所選擇的摘錄內容也常常出人意料，很新鮮。西方文學作家和作品是伴隨我們長大的，早已為我們熟知，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常常感到，摘記內容的選擇如此睿智，竟讓我們刮目相看。楊先生把它歸因於錢先生所特有的天份：“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們仨》第三部第十三章）

事實上，錢先生摘錄的作品不是隨手就記。摘錄的藝術首先是對每部著作的用心體會。錢先生絕對不固守讀書的第一印象。像楊先生說的那樣：摘錄僅僅是他多次仔細閱讀之後的最後一步。他的閱讀速度和接受能力絕對是超乎尋常的。他完全靠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把成段的内容理解成一個整體，再把它們重新寫成流暢、沒有錯誤的筆記，而不用再擔心地去看書來查看寫得對不對。

各篇摘錄的內容篇幅長短差異極大，從短短的幾行到幾百頁都有。原因很簡單：作品品質越高，所選作品與他的興趣關聯越緊密，錢先生摘錄得越詳細。讓人驚訝的是他的毅力。幾十頁，甚至是幾百頁寫得密密麻麻的摘錄筆記並不少見。

萊布尼茲有個習慣：所有讓他感興趣的東西都要記錄下來。而他對一切感興趣，特別是對非同尋常、乃至怪異的東西。借助於文字，他把信息深深地銘刻在驚人的記憶裏，用這種方式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字筆記。這一點，萊布尼茲與錢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些筆記本和卷宗表明：錢先生總是一讀再讀，甚至是朗誦，還加了許多注釋和大量的說明。即使重病中他也没有停止閱讀和抄錄。或許，對他來說，這也是他身處逆境時最好的良藥。但是，更為重要的應該是這些内容是靈感的源泉，讓我們看到一位學者和藝術家令人感動的工作動力。

錢先生的筆迹以其優美、飄逸、洗練吸引人。看他的筆迹能讓讀者獲得享受，讓讀者着迷。他的筆迹不是純粹注重速度的簡練的草書。即使是密密麻麻寫滿小字的筆記，個個字母也是寫得有模有樣。特別是在年輕時期，篇首字母寫成花式的大寫字母，小寫字母上邊出頭部分和下邊出頭部分拖得長長的，非常遒勁有力。他偶爾插入的圖畫體現出細膩的觀察和準確、流暢的線條。誠然，他的字迹也隨着歲月變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筆迹中留下了痕迹。20世紀60年代以後，錢先生用圓珠筆取代了鋼筆。筆記中書寫錯誤總是非常少，改正的地方也很少。錢先生懂多種語言，他閱讀和摘錄的基本上是原文，因此他筆記文字的完美就更加令人驚嘆了。

即使是打出來的手稿也因其打字錯誤非常少而引人注目，因為錢先生使用的是兩指打字方法，就更加讓人覺得了不起。在打出來的手稿中，綫條活潑有力的對鉤、手寫的更正、用筆加上的法語讀音的重音，這些表明：錢先生總是不斷研究他的筆記，不斷進行修改。

從這些筆記在錢先生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出發，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想：他曾有過出版某些筆記的想法？這完全有可能。他曾把上千頁筆記彙編成一個卷宗，標題為“Chop-Suey being/ The Commonplace Book of C. S. Ch`ien/1949”（第157本）。錢先生給它們編了頁碼，使它們真正具備了一部書的面貌。

西方有各種類型的摘記作品，比如說蒙田的《隨筆錄》、叔本華的《附錄與補遺》、伯頓的《憂鬱的解剖》，其吸引力恰恰在於出人意料地重新組織在一起的引文。錢先生的《外文筆記》則更向前邁進了一步。他摘錄的引文是有意識地不與他自己的想法混雜在一起的。在博學和謙虛的摘錄背後難道不正隱藏着獨特的創造意識，甚至是向一個全新的文學類別的邁進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外文筆記》的出版將面向什麼樣的讀者呢？也許它應該面向的是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是中國和西方比較文學專家或者恰恰是——未來的世界公民。

四、民族間的溝通

錢先生在如此廣博的程度上掌握了西方文學，他以這些筆記來表達對西方文學價值的高度評價。一家中國出版社能夠在他的友人的支持下出版這樣的遺產，這將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對民族間交流的慷慨貢獻。因為從中國國內來看，這部多卷本的筆記是一部外文著作。讓西方人捫心自問：有沒有一家西方出版社會出版與此類似、內容極其豐富的中國文學著作集，而且還是由一位歐洲學者、用中國書法手寫而成的？通過這樣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這項工作的非同尋常之處。

除了楊先生，吳學昭先生是不遺餘力推動筆記出版、走向成功的人。照她自己的說法，她這樣做是因為她意識到這部文獻作為中西文化橋梁的意義。它的出版是比較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同時也是中國和歐洲交流的里程碑。這種表白，飽含對相互文化的尊重，也許、甚至可能是通向和平美好未來的唯一途徑。

〔德〕莫芝宜佳 莫律祺

（唐峻 譯）